

社科文献论丛第8辑 / 曹剑南主编

中国周边国家 汉诗概览

ZHONG GUO ZHOU BIAN
GUO JIA HAN SHI GAI LAN

毛 翰◎著

线装书局

CC-0



定价:260.00元(全10册)

社科文献论丛第8辑/曹剑南主编

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

毛翰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 / 毛翰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8. 9

(社科文献论丛第 8 辑/曹剑南主编)

ISBN 978-7-80106-839-2

I. 中… II. 毛… III. 汉语—诗歌—文学研究—东亚
IV. I310.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783 号

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

著 者: 毛 翰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版设计: 秋 水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定 价: 260.00 元 (全 10 册)

本书得到华侨大学
施子清教师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跨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毛翰《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序

孙绍振

翻阅《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不禁为之惊叹，倘若没有毛翰先生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发微探幽，系统地精选出朝鲜、越南、日本以及琉球的汉诗大系，我怎么可能在短时间里饱览这灿若星汉的千年艺术画廊。就连一般中国人也望而生畏的古汉语、文言文，竟被异域诗人如此得心应手地驱遣，那跨语言、跨文化的鸿沟，竟是这样被轻松而优雅地越过。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大精神奇观，一大文化奇观，又是一大艺术奇观。

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美学角度看，实质上也是一部“按照美的规律”塑造民族审美心态的历史。诗词正是审视和塑造自我的历史长河中最动人心魄的涛声。而这涛声，不是孤鸣，而是交响。这塑造，既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立自主的升华，又是外来文化精髓的交融和同化。只有那能够体现民族文化传承和时代风貌，吐纳本土精神和外来文化的作品，其审美积淀，才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一切的诗歌天才都不仅仅由于个人禀赋，而且也得益于本国、外国诗性文化的滋养。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潮流日渐汹涌，跨文化研究正在为学术界掀起别开生面的视界。但是，学术界的浮躁一直是可虑的现象。以引进西方新潮文论的结论为满足，以抢过理论的前卫大旗为荣，以领先话语制高点为务，时髦的喧嚣有时甚至淹没了学术的苦孤诣。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新名词大轰炸”之嘲，后来又有“新术语超市”之讥，直到本世纪初，此等



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

华而不实的现象仍然此起彼伏，给人以滔滔者天下之感。有志者虽怀不眠之忧，亦徒有无力正乾坤之叹。毛翰先生面对此等现象，并未作狮子吼，而是以习惯性的无声的微笑，不求闻达，积多年之辛劳，乃成《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之书，作为对于这一潮流的回答。

本书以东亚四邻的汉诗发展史为线，以断代为面，以名家名作为点，力图展现中国周边国家汉诗发展的多元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这种跨民族文化的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并不是一种畸形的例外，只要回顾拉丁文学在欧洲早期的跨国流行，就不难发现，此乃特殊历史时期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翰的工作显出了比较文学、跨文化的深刻意义。

从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的汉诗上溯，探寻中国古典诗歌与邻国汉诗的文化共时性和共通性，找到这个逻辑起点以后，毛翰先生接着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中国诗歌及诗学的流播，二、邻国汉诗的审美流变。面对各国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源远流长的吸纳、仿效及交流的复杂历史，毛翰显示出真正的学术勇气，他并没有仓促拿出惊世骇俗的断言，而是系统地积累、梳理学术资源。做这样的工作，其繁琐，其艰辛，往往不为外人所知，但是，其学术功力和毅力却不可小觑。急功近利的人士，是不甘心把冷板凳坐到这么多年的。做这样的基础性工作，令人想起齐威王所谓“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一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精神。但是，一飞冲天谈何容易，每一飞腾，都要付出多少辛劳，才能把读者带到那遥远的古代文化语境中去。

在《朝鲜汉诗概览》一章中，毛翰指出：“朝鲜的汉诗，最早可以追溯到箕子在朝鲜立国后，回到故国之所作。《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从朝鲜归来，朝见周天子，经过商朝故都，见宫室被毁，夷为农田，遍生庄稼，不禁伤怀，于是作《麦秀》之歌。”“《笠篔引》《黄鸟歌》等为四言诗，沿用着中国《诗经》的体式。（黄鸟意象亦屡见于《诗经》。）其后则与中国一样，流行五言诗、



七言诗。”其《日本汉诗概览》一章指出：“日本汉诗诞生于天智天皇时代，是中国古诗流播海外衍生出来的一大支脉。”“根据其兴起、承续、鼎盛、衰落的历程，也不妨把日本汉诗史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名之。”其《越南汉诗概览》一章指出：“越南汉诗的出现却相当晚。或许，曾经出现的诗篇，没能保存下来，随着岁月一起散佚了。”“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首越南人作的诗，是廖有方《题旅棹》：‘嗟君没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载于《全唐诗》。”其《琉球汉诗概览》一章指出：“想琉球蕞尔小国，其面积和人口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普通县份，竟有这么多诗人骚客，一次册封，与清朝使臣唱酬，竟会涌现这么多风雅醇正的诗篇，真让人刮目相看！”可贵的不仅仅是片断的资料，而是其系统性。只有系统化了，才能发现传承的内在的逻辑，或远，或近，或兴、或衰，邻国的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都存在薪尽火传的内在联系。朝鲜汉诗一篇的结语中引用李氏朝鲜国王宣祖李昖的一段话很有趣：“设使以外国言之，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如果不从大汉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这样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时光的隧道，真切感受当年的文化气场。

本书以史为脉络，以论为纽结，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真切地再现了朝鲜越南日本琉球汉诗的兴起、承续、鼎盛、衰落的历史轨迹和动态结构，抚古今于须臾，寓千载于一瞬，各国汉诗的纷繁变幻的历史景观尽收眼底。尤其可贵的是，毛翰先生能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站在当代的高度审视古典文献，同时又十分珍惜各国汉诗中的独特风貌，显示了历史主义与当代思维相结合的睿智。以越南汉诗的研究为例，毛翰先生按编年史的方式展现了越南汉诗的宏伟画卷后指出：“从宗藩关系的角度看去，越南汉诗不过两大倾向：即对于宗主国的离心或向心。表现离心倾向的作品，是争战、分裂和对抗的产物，是其民族独立意识的结果，以李常杰《南国山河》



和邓容《感怀》为代表，作品尽管很少，却颇有分量和杀伤力。表现出向心倾向的作品，是中华文化的强大魅力与亲和力的产物，是文化认同感以及历代南迁者的民族认同感的结晶，大概可以胡季犛《答北人问安南风俗》、范汝翼《题新学馆》、冯克宽《答朝鲜使臣李暉光》和邓陈琨《征妇吟曲》为代表，以篇目计，占了越南汉诗的绝大部分，其情思韵致与中国诗歌水乳交融，往往见不出什么差异。”跟随毛翰先生，以诗读史，以史出论，在诗、史、论三者结合中，游走于龙蛇之门，穿梭于历史硝烟，不难发现诸如此类的历史洞见比比皆是。

个体在社会环境中所显示出来的独特的审美创造力，是推动审美心态发展的直接契机，往往孕育出最有生命力、最有价值的审美实践的结晶。毛翰先生通过典范作家与典范作品，突显邻国各个时代的汉诗的最高艺术成就。所选近千首诗，都是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定的心理感情和特别的艺术境界的凝结升华。再加上毛翰先生在深刻地阐明其优美的韵律、绚丽多彩的语言，读者不难享受到身临其境审美感知。

特别有趣的是本书的十二篇附录：崔致远《檄黄巢书》、李承休《帝王韵纪》、申晔《再造藩邦志》（节录）、姜公辅《对直言极谏策》、陈国峻《谕诸裨将檄文》、莫挺之《玉井莲赋》、张汉超《白藤江赋》、阮廌《平吴大诰》、邓陈琨《征妇吟曲》、佚名《怀风藻·序》、大桥若水《本朝三字经》和向德宏《上李鸿章情愿书》，均堪称汉文化的奇葩。尽管作者身份不同，诗赋文章等形式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一例外表现出周边四邻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曾经有过的一体化的联系。例如：崔致远十二岁由新罗来长安读书，十八岁考中进士，出任宣州溧水（今属南京）县尉，后遭逢黄巢之乱，应召入淮南节度使高骈幕下，写下《檄黄巢书》。陈国峻，越南陈朝宗室，抗元名将，其《谕诸裨将檄文》，一口气举出中国历史上一系列忠臣义举，鼓舞其麾下将士保家卫国的斗志。向德宏，琉球王国紫巾官，琉球末代国王尚泰的妹婿。1876年12月受其国



王秘遣，前往中国请求救援。1879年日本强灭琉球国，向德宏两次上书李鸿章，1885年三上其书。十一篇附录，均表现出宏富的文化魅力，既有其本国特色，又表现出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人生境界追求、理想人格建构等特点，与中国传统诗文风格相近，形式相类。事实上，当我们侧耳倾听邻国诗人在历史深处的低吟高唱时，眼前浮现的还是剪不开、斩不断的跨民族跨地域的相互联系的东亚文化之网。

当我们欣赏毛翰先生为我们所展现的各国绚丽的汉诗时，不能不关注各国汉诗的历史命运，不能不关切曾经血脉相连的各国文化传统在当今时代的走向，这也就是毛翰《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一书所注目的。毛翰先生在书中指出：朝鲜自“1945年以后，半岛南北不约而同地停用汉字，汉诗遂成明日黄花。在箕子故国，在昔日的‘小中华’，存在了两三千年，繁荣了一千多年的汉诗，对于只识谚文不习汉字的现代朝鲜人，已经无异于‘外国文学’了。”对越南而言，自“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到来，又创造出一种记录越南方言的罗马拼音文字，并逐渐流行开来，构成对汉字的另一种挑战。由于法国殖民主义当局的刻意排斥，和1919年科举制度的最后废除，汉字汉诗在越南逐渐式微。至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胡志明宣布全面推行罗马拼音文字教育，汉字遭废止，汉诗亦退出历史舞台，只残存于华人社区。对于现代越南，这意味着去中国化，意味着强化其国家的独立自主，也意味着自断其两千余年来的历史文化血脉。”毛翰先生还指出：“一千多年的日本汉诗，从奈良时代前后的兴起，五山时代的成长，江户时代的繁荣，到明治维新后的再度繁荣后的渐行寥落。”这是历史的困惑，这是现实的悲哀。在本篇结语中，毛翰先生的一段引文颇为耐人寻味：“日本学者加藤彻2006年2月出版的《汉文的修养——什么创造了日本文化》一书指出：在日本，有的人认为，汉文只不过是外国语，汉字只不过是中国人创造的外来的文字，所以应当加以排斥。那么，大米也只不过是从中国内地传来的农作物，所以我们提倡不吃大米怎



么样？大米之外，从酱油、茶到大萝卜，这些标准的‘日本食品’都是从中国内地传来的。那么，在日本搞一个不喝酱油、不饮茶、不吃大萝卜的运动怎么样？而朝鲜半岛和越南排斥掉了汉字汉文，又得到了什么呢？”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世纪，是中国文化大转变的世纪，也是世界文化大交汇的世纪。历史的遗产值得珍视。朝鲜、越南、日本、琉球汉诗曾有过艰难而辉煌的历程，把其中优秀的，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用现代眼光加以审视，把它们融入现代美学体系的结构之中，是今人的责任。但是，要这样做的前提，就是收集资料，系统地、全面地占有资源。这是一项扛鼎的工作，不是一般大而化之的搬用西方文论那么热闹，那么容易引人喝彩。毛翰作了这样的选择，为异国汉诗的跨文化研究甘当拓荒者。对于正当壮年，学术研究正面临着可观前景的毛翰来说，甘于寂寞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又功德无量。

作为诗人兼诗歌评论家的毛翰先生在撰写《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一书时，融进了他本人极深的情感，在进入特定的邻国汉诗审美情境之后，他以充满独具情韵的眼光来观赏与晤对，他不只是用眼，更是用心来观察，来写作，从他的文字中，可以品味他的诗人情怀，品味他的历史的感伤和愤懑。毛翰先生在《日本汉诗概览》一章的结语中深沉回顾：“当中国《诗经》已位居六经之首，风雅遍布神州，以至于‘不学诗，无以言’之时，孤悬海外的日本还处在蛮荒蒙昧之中；当中国诗歌进入盛唐登峰造极之时，日本诗歌才牙牙学语，临帖描红。但日本又是一个极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民族，一个幸福的民族。‘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从徐福、鉴真，到朱舜水，一代一代的华人东渡，不断地给这个民族注入新的文化血液。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华夏中国诗人辈出，是日本取之不尽的偶像和法帖。”面对如今的文化断裂，中华传统文化面临挑战的现实，他在《朝鲜汉诗概览》一章的结语中直抒胸臆：“我们该有的，只是复兴中华的责



任，再造盛世的使命。毕竟，只有在中华文化辉煌的时代，才有人‘每慕中华’，‘愿生中国’，‘梦至京师’；只有在中华民族强盛的时代，才见‘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才有人僭称中华。”赤子之心，拳拳之情跃然纸上。

细读到此，谁能不为毛翰先生的情怀感动，为他在理性思考中的激情所振奋！历史也许已经过去，但情理交融的思索却永远不会休息，思想者永远只能在思想的痛苦中享受欢欣。

眼下福州正是酷暑，受毛翰先生热情所感染，作此序。

2008. 8. 4 福州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诗国旧版图，学苑新篇章

——毛翰《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序

吴勵生

毛翰兄的新著，已经有了我所崇敬的孙绍振老师的大序，实在用不着我再来饶舌，但除了盛情难却，就是我曾经写过毛翰三论，所谓“知人论世”，多少也有点责无旁贷。

按我们传统的学人家法，众所周知是“照着讲、接着讲、自己讲”三步骤，既然孙老师点明毛翰的此著乃“跨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我就照着孙老师的“跨文化研究”话题接着讲。“跨文化研究”诚如孙老师所指出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大转变”“中国文化大转变”“世界文化大交汇”的结果。而“交流”与“对话”显然是其最根本的学术冲动，同时这种学术冲动又必然带来“打通”的学术倾向。然而，这个“通”早已不仅是古今“打通”而且是中西“打通”，也即人们喜欢说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意思，事实上谈何容易！不管是通还是不通，这多年我们的比较文学、比较史学等还特别热闹，跨文化研究正在成为前沿课题。按照陈燕谷先生的归纳，比较文学有过影响研究（如“莎士比亚在德国”）、平行研究（如“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后殖民批评研究（如“鲁迅与被表述的国民性批判”）三个阶段。陈燕谷建议进入“新帝国治下的比较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第四阶段。而我更愿意认同周宁博士对“第三”或“第四”阶段的修正，他以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关注的是不同文化间关系中的陷害与屈辱、冲突与危险的一面，却没有提供一种交往理性、对话精神的可能性方向，因此提出“间性研



究”，他以为“后殖民主义批评”模式只是从“平行研究”到“间性研究”的转型的过渡形式。窃以为，这不仅特具理论眼光，而且抓住了“比较”的关键。说白了，如果不是为了“交流”又何必“比较”，如果我们始终缺乏“对话”的资格和精神，“比较”又有何意义？

也如孙老师所言，跨文化研究之所以重要或者成为理论前沿，实在跟日益汹涌的全球化浪潮有关。而首当其冲的问题，也便是周宁所指出的“主体间性”问题，也即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不同文化主体如何交流和对话的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首先需要追问的当然还是“主体性中国”的问题，或者换句话问：何为中国的文化主体？而这也才是孙老师所说的“毛翰显示出真正的学术勇气，他并没有仓促拿出惊世骇俗的断言，而是系统地积累、梳理学术资源”的深刻用意所在。道理非常简单，全球化程度越高，本土化的强调就变得越重要，因为无论是全球化论者还是反全球化论者，不可忽视的仍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多元全球化”或者“复数全球化”的强烈诉求。而作为我们自己，首先必须解决的便是，我们如何重新确立我们自身的文化认同？

而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讲，一是本真性，二是多向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也即在他者“镜像”中解构和建构自身，也即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的过程。后者太复杂跟毛翰新著也没关系暂且不论。从本真性的角度讲，举个简单的例子，陈平原曾经说道：“所谓‘礼’，并非只是仪式，很大程度是一种心情。辜鸿铭认为，‘礼’应该译为‘Art’，而不是‘Rite’；周作人对此大为赞赏，称这就是‘生活的艺术’，不仅仅在于调和禁欲与纵欲，达成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还包括控制理智与情感，调节社会与个人，兼及庄严与轻松等，确实是一门艺术。”“礼”是一种心情，是一门艺术的说法，跟孙老师的“‘按照美的规律’塑造民族审美心态”以及“理想人格建构”的说法实则一脉相承。换成我自己的表达则是“本真性”认同，因为你一旦拥有了这种心情或者“艺术”，便应该会极



自然地被认同为“中国人”。但我们现在若想再做一个这样的“中国人”，又实属不易。

以毛翰的《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为例，其实我在“毛翰论之三”已有过一些基本批评，我曾指出：泱泱中华，曾几何时，哪里仅仅是个诗国，它更是个威加海内外的大帝国。不用说越南、朝鲜、琉球诸藩国，即便是日本（也曾称藩纳贡），哪里仅仅是复制华夏诗国的传统，而是从文字、礼仪、典章、制度一一如法炮制。无论是朝鲜、越南，还是日本、琉球的汉诗，均与传统中国的汉诗几无二致。如“越南的汉诗，即使其题材、主题与中国无关，即使只是一般的述怀言志、唱酬赠答之作，也往往会表现出中国式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精神情操、审美情趣，以及人生风度和处世姿态。其表现手法，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托物言志、咏史述怀、寄情山水田园，其意象，其语言，其风格，也多与中国诗歌如出一辙。”因为难就难在“礼”还真的不好说就仅仅是一种心情或者一门艺术——也即一门关于伦理秩序的艺术，懂得这样的艺术我们就能享受到一种“快乐的心情”——同时它确实还是一种制度，不仅仅是文化制度而且更是政治制度，而在这种文化制度和政治制度里面，我们还不好说就真能享受到一种“快乐的心情”和“审美的愉悦”。

周宁在介绍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对中国的相关看法时曾说：“在没有健全的法律、强大的国家力量与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秩序是如何保持的。中国的孝道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在政治上成功的秘密在于建立了以孝悌为基础的宗法式政府体系’。麦都思的看法代表着许多人共同的观点。中国文明是一种奇特的东方式文明，其特性不在于它像所有的东方文明那样落后腐败，而在于中国特有的一种稳定的停滞与封闭的完整性。”也就是说，没有“孝悌”的支撑，这个“礼”可能也就很难成为“艺术”，换个角度说，如果没有时间上的某种“停滞”和空间上的某种“封闭”，“礼”又如何可以成其为“礼”？因为“礼”的最基本要求便是安于



本分，“礼”的原生义是指敬神，后来引申为对等级秩序的发自内心的虔诚以及敬重，以及为表示敬意而举行的隆重仪式等。因此，“礼”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基础，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实际上便是建立在道德体系之上的。那么，朝鲜、越南、日本、琉球首先学习的当然应该是这一套对秩序的管理的“礼”，日本甚至把其中的“仪式”部分发展到了病态的地步，以至日本的礼貌和艺术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了日本文化的象征。然而，20世纪毕竟是个“社会大转变的世纪”、“文化大转变的世纪”，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第一场启蒙运动的“五四”时期，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封建礼教进行全面的批判和颠覆。日本不用说，经过“变法维新”、“脱亚入欧”，二战之后居然成为“西方七国”之一。韩国也不用说。即便是朝鲜和越南，如果说跟我们尚有体制上的某种传承关系的话，后来在苏联体制的干预影响之下，跟我们早已貌合神离，而当下，朝鲜不过是“要面包”，仓廩不实何谈礼，越南的“革新开放”步子甚至比中国迈得更大……在现代化（西化）浪潮面前，中国的“诗书礼乐”的传统文明不仅在中国周边即便在中国本土也早已分崩离析。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西方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都比东方更迷信，东方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也比西方更先进。西方人认为，理性是西方文化精神的精华，可直到18世纪，西方主张理性的启蒙哲学家还推崇中国的理性与宽容精神，批判西方的神学与宗教政治迫害。”而毛翰提供的这部《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新著便是个特别有力的证明。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我们的落后和停滞，实在是跟我们生存秩序的腐朽有直接关联，西方在地理大发现和文化大发现的过程中，通过思想启蒙、制度变革直至技术革命，三百多年来则显出勃勃生机，所向披靡。从文化的角度讲，文化输出从来就是只有强国向弱国传播，而绝不可能是相反，毛翰的《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就是明证，而今潮水般涌入的西方读物、好莱坞电影（VCD、DVD）、肥皂剧、流行音乐等等，就跟满大街充斥的麦克唐纳的汉堡包、肯德基的家乡鸡一样，则更是明证。



现在的问题是，一如余英时阐发陈寅恪之观点并发挥时所说：“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建制’一词则取其最广义，上自朝廷的礼仪、典章、国家的组织与法律、社会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包括在内。凡此自上而下的一切建制之中则都贯注了儒家的原则。这一儒家制度的整体，自辛亥革命以来便迅速地崩溃了。建制既已一去不返，儒学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变成了‘游魂’。”随着儒学建制的崩溃，道家哲学的反智与消极主张其实也随之崩塌，不说儒道互为表里，道家大致也是为批判儒家或者与儒学合流共存亡。而依附于其上的诗文传统，也一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梁启超时代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直至延伸到“五四”的“文类位移”，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眼下更关键的问题是，世界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之中，即便是进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单线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已受到了空前质疑，从而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现代化研究范式也一样在国内受到空前质疑，于是，我们的问题甚至是切身问题，也即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再次浮现了出来。我们是谁？我们的真面目又在哪儿？如果我们一定要强调“多元的现代性”，那么我们的“文化本真性”又在哪儿？如果并不清这些问题，我们又如何有“主体性”？如果没有“主体性”我们又该当如何跟人家谈“主体间性”？那么，“间性研究”的根本意义又会在哪儿？

当然，我们仍然相信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相信它有能力把异质文化改造成融入我们自身血肉的东西，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向那些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们学习，然后重新建构我们自身的现代秩序原理，然后重新建构现代性民族国家的中国形象。那么，诗人何为？盛世如何再造？当代中国诗人还有这个能力么？莫非文学仍然还是我们的“经国之大业”？！难道，文学不是一项完全独立的有着自身的运作逻辑的事业么？即使那样，曾经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托身之所的儒学建制而今又在哪儿？既然“不学诗，无以言”的儒